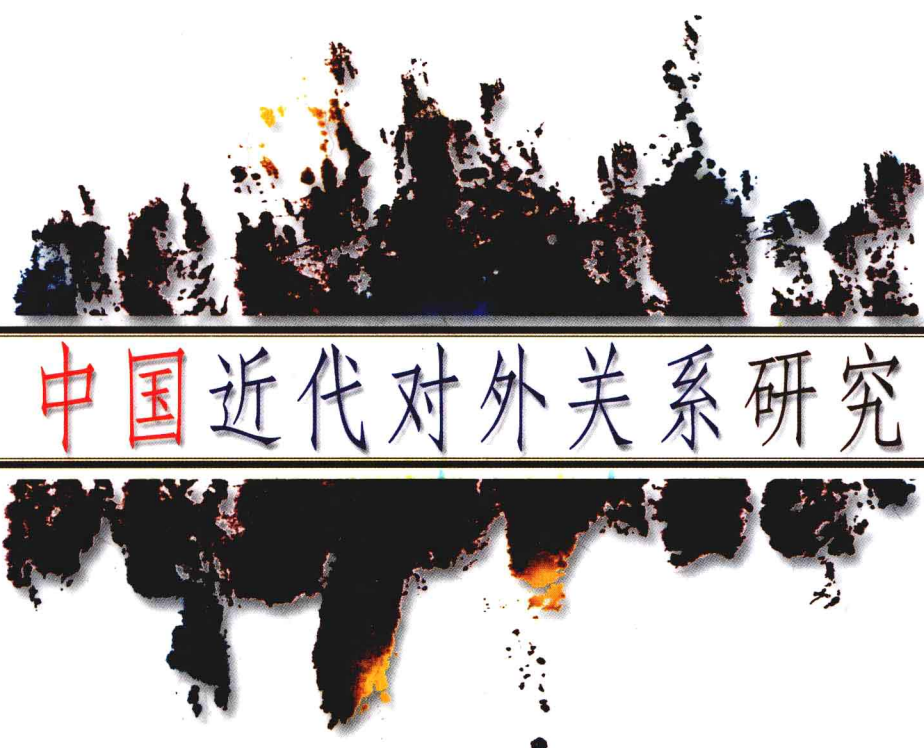


邵 雍 □ 著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研究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邵 雍 著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研究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研究/邵雍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 3
ISBN 978-7-5650-1244-0

I. ①中… II. ①邵… III. ①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近代
IV. ①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2175 号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研究

邵 雍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金 伟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电 话	总 编 室:0551-62903038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印 张	22
网 址	www. hfutpress. com. cn	字 数	430 千字
E-mail	hfutpress@ 163. com	印 刷	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1244-0

定价: 58.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研究》是邵雍教授多年来从事教学与科研的结晶。其主体是他30年来撰写的相关论文，部分是在他指导之下本科生、研究生撰写的论文。这些论文珠联璧合，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整体展示了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教学与科研的水平，对于今天我们拓展全球视野，正确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广泛进行中外交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

邵雍著《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研究》研究领域广阔，从国家而言，涉及英、法、美、俄（苏）、德、日、朝、越等国；从时期而言，包括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瓜分狂潮、反洋教斗争、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洋军阀统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从人物而言，既有林则徐、袁世凯、李鸿章、孙中山等政界巨匠，也有文祥、王闿运、张荫桓、顾维钧等政治家、外交家；就内容而言，则包括外交人物专论、外交事件探析、外交思想研究、外交文献解读等等，给我们展示了一幅视野广阔、构思独特、新论迭出、史料确凿的近代中外关系的历史画卷。

邵雍教授治学勤奋而严谨，是一位多产的学者。其研究特点之一是实事求是，一切从事实出发，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走近历史，给予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恰如其分的解释和客观评价。如在本书中他对林则徐、徐继畲、洪仁玕、肃顺、文祥、唐景崧、孙中山等人的解读都是将他们放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加以客观剖析，充分展示了他们在处理对外事务时的困境、苦衷、苦心与策略，值得人们回味三思。

研究特点之二，是十分注重档案史料，尤其关注媒体资料的运用。如对《纽约时报》、《申报》、《谨遵圣谕辟邪全图》等均进行过细致的样本分析与详细的解说，从社会舆论的角度推进了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研究。

研究特点之三，是数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锲而不舍。据我所知，邵雍教授在求学期间曾经选修过季平子先生的相关课程，引发了学术研究的兴

趣。研究生毕业留校后，又常年开设中国近代对外关系课程。他博采众长，勤于写作，不断丰富、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同时以极大的热情毫无保留地向学生传授知识与研究方法。收入本书的有不少学生们写的论文，从选题、取材、立意等方面都得到了邵雍教授的精心指导，有的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我和邵雍教授已有二十年以上的学术交往，在我的研究工作中不断得到他的热情支持和真诚帮助，尤其是他应聘为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后，对于我们举办的各种会议及学术活动几乎是有邀必应，提供了不少高质量的论文，为我们的研究论丛和学术会议增光添彩，在此谨表示深切的谢意。

应邵雍教授之邀为本书作序，荣幸之至！是为序。

复旦大学教授、博导 石源华

2012年2月20日

目 录

序	石源华 (1)
绪论	(1)
林则徐广州禁烟与美国人的关系	(7)
鸦片战争后徐继畲在福建的对外交往活动	(20)
洪仁玕与西方传教士	(41)
马神甫事件略论	(48)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肃顺等人不是主战派	(57)
近代前期沙俄东正教团在华活动的实质	(64)
《纽约时报》视野下的上海城市化进程	(75)
晚清人士对多边对外关系的认知	(82)
文祥的对外应对	(95)
王闿运的外交思想	(103)
中法战争时期的会党动向	(107)
《申报》与晚清外交	(115)
张荫桓的外交思想及实践	(120)
1874 年日本出兵台湾	(134)
巨文岛事件与李鸿章 (1885—1887)	(137)
袁世凯在朝鲜 (1884—1895)	(141)
中日广岛谈判	(144)
唐景崧与甲午战争	(156)
甲午战争前后的中韩边界问题与东北亚国际关系	(164)
1896 年李鸿章出使俄、德之比较研究	(177)
李鸿章访美研究	(189)
《点石斋画报》视野下的中西官方交往	(202)
《纽约时报》视野下的唐人街	(206)
从德国占领胶州湾前后各国态度看列强在华势力竞争	(213)

《谨遵圣谕辟邪全图》之解读	(219)
《申报》对义和团运动的舆论导向	(228)
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法国与中国的关系	(238)
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关系	(246)
武昌起义前后英国对华外交研究	(258)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与英国及英国人之关系初探	(270)
外国侵华势力对上海五四运动的破坏	(279)
中西基督教徒与五卅运动	(284)
孙中山与苏俄	(292)
北洋政府在处理中东铁路问题时对苏俄外交上的策略与失误	(298)
1927—1937 年中德外交关系略论	(309)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应对	(323)
顾维钧与抗日战争	(330)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与朝鲜的关系	
——以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为中心	(337)
参考书目	(344)
后记	(347)

绪 论

一、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国际背景

1840年英国首先发动鸦片战争，在西方列强中最早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紧锁的大门，逼迫清政府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在这以后，美、法、俄、德、日等国相继侵略中国。至19世纪末，在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德、俄、日、英、法各国各自圈定了在华的势力范围；美国则打着“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旗帜，形成了列强多角并立的局面。

列强在华互相勾结，掠取各种侵华权益，又互相争斗，为扩展各自的在华势力和排斥他国时常发生冲突。列强之间为维持还是打破在华“均势”进行了反复的较量。



列强在华均势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国家忙于互相厮杀，给日本在远东的异军突起创造了条件，后来逐步形成了日本与英、美、法等在华对立的格局。

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各自文化背景、经济实力和进入中国的时间不

同，因此在侵华政策、手段及发展重点方面有很大的差异。

英国始终把获取各种“通商”特权作为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重点是维护和发展其在华的巨大经济利益。美国结束追随英国之后，打出了“门户开放”的旗帜，以“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为号召，从而使它在对华关系中占据着比其他列强更有利的地位；在日俄战争后与日本不断发生冲突，但又不肯与日本轻易闹翻。

沙俄侵华的主要特征是穷凶极恶的领土扩张。

法国侵华的重要特征是披着传播天主福音的宗教外衣，扩张势力。

日本对华政策的主要特征是利用地域邻近的方便，动辄使用武力，不断对在华“均势”发起冲击，企图独霸中国。上述国际背景决定了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内容与走向。

二、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内容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是统治阶级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二是先进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两者都是重要的。前者应该是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研究的主要内容，后者也应充分注意，但后者更多的是政治史研究的对象。

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时期还不懂近代意义上的外交。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为了借兵助剿，镇压太平天国，不惜牺牲外交上的重大权益。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的加深，清政府与列强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但是双方始终存在着权利利益的冲突，否则清政府就不是清政府了。只有外国侵略者一手炮制出来的傀儡政权如伪满洲国、汪伪政权等才是完全卖国的政府。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是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背景下展开的。过去有种说法叫“弱国无外交”，并不完全正确。事实上统治集团中的某些成员，包括一些外交人员，他们身处弱国困境，但强烈的爱国意识促使他们为中国跻身强国之林而奋力拼搏，为维护国家主权利益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例如，曾纪泽虎口夺食，改定《中俄伊犁条约》，杨儒为收回东北三省主权进行反复交涉，直到以身殉国。这些都是应当肯定的。否则弱国、小国在强国、大国的侵略面前只有忍气吞声的份了。

清朝政府与北洋政府长期奉行“以夷制夷”的策略，李鸿章在这方面是个代表性的人物。他在主持近代对外关系的30年



曾纪泽像

中竭力推行这一策略。这种策略既是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付周边或内部少数民族的传统思想的继续，又是近代西方力量均衡理论对中国的影响的反映。事实上利用国际关系上的矛盾，联合、利用或依附某国来对抗另外的国家，谋求实现本国的外交目的，本来是近代西方国家都采取的外交手段。清朝政府在权力不断衰落、军事防卫能力又较差的情况下，为了挽救外交危局，在列强的缝隙中求取生存，本来无可厚非，问题是《虎门条约》（1843年10月）第八款片面最惠国待遇的规定使中国丧失了“以夷制夷”的主动权。其中规定“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其他各国与中国订约时也都坚持这条。因此任何一国从中国夺取的权利，他国均可共同享受。在这种情况下，“以夷制夷”的策略在中国不可能取得什么重大的成效。真要“以夷制夷”，只好订立密约了。

三、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结果

结果之一是影响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从1840年起，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战争，清政府被迫在对外交往中与主要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失了香港以及东北、西北的大片土地和对周边国家（朝鲜、越南）的保护权，列强在中国夺取了协定关税、治外法权、驻军、租界、租借地、势力范围、沿海贸易、内河航行以及片面最惠国待遇等大量特权，使中国传统的封建统治迅速瓦解，演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结果之二是引发了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促进了中国近代的革命。中国近代各阶级、阶层的爱国者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斗争。除了上面提及的统治阶级中的某些成员外，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各派（维新派与革命派）和无产阶级都是以反帝爱国为旗帜。中国近代的民主革命是由帝国主义侵略所引发的。

结果之三是随着中外交往的发展，西方物质文化以至政治法律制度逐渐传入中国（包括国际法），促进了中国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启蒙和建立，推动了近代生产方式及新兴阶级（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引进了市政建设、市政管理，因此向西方学习，又是中国近代化的主要线索之一。

总之，研究近代中国的对外关系，对于研究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不等于帝国主义侵华史。

四、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研究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研究基本上被帝国主义侵华史所取代，而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方向又是服从于现实的外交斗争。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美国出兵朝鲜，并武装侵占台湾，中国人民掀起了抗美援朝运动，于是有了《美国侵华史》。

“文革”开始后，中苏关系急剧恶化。1969年春中苏在珍宝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一直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前，两国实际处于冷战状态，于是有了四卷本的《沙俄侵华史》的问世。

在中国近代史上，日本曾经两次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民族灾难，但至今仍无实质性的认罪表现。相反，历届日本政府首脑总是要去参拜靖国神社，在细川护熙任首相之前，日本根本不承认过去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1972年日本国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时，把侵略战争说成是“给别人带来的麻烦”，当即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严厉批评。后来在修改教科书时，将侵略改为“进入”，引起了中国政府以及亚洲各国政府的谴责，于是有了《日本侵华70年史》。

就研究的基本理论而言，基本上是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提出的观点。粉碎“四人帮”后，有的学者提出，在对外关系方面是否只有友谊与侵略两种模式？还有没有第三种，例如纯粹是与中国做生意赚钱？我们认为第三种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很难说正常的经济贸易就是侵略，也很难说它一定是什么友谊。包括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大陆投资设厂开店的外国资本家，他们这样做，并不完全是他们口头上所讲的帮助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是利用中国政府所给的优惠政策与相对廉价的当地劳动力赚钱。

过去又有一种传统观点，即各国对华关系、对华政策的主要根据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如帝国主义国家一定是侵略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而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苏俄、苏联对华是和平友好的。其实并非如此。就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而言，它的对华政策仍然是从本国的直接利益出发的。例如在二战后期，只是由于雅尔塔协定满足了斯大林对中国东北、蒙古地区的特权要求，苏联政府才同意出兵，对日宣战。因此各国（包括苏联）的对华政策完全是从其自身利益出发的。一个国家的阶级属性可能在很长时间里是不变的，但是它的对外政策一定是要经常变化的，化敌为友、化友为敌的现象在国际关系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懂得这一点，就会知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南与中国关系的曲折发展了。对越南来讲，这些年来，它的国家阶级属性并没有什么变化。

20世纪50年代，大陆出版的近代史著作基本不提沙俄侵华，有个别人写了这方面题材的论文，即遭到政治批判与组织处分。只有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仍对此直言不讳。

50年代及以后出版的苏联人写的著作中，每每为沙俄政府的对华政策辩解，流毒很广：

（1）沙俄政府在19世纪40年代要夺取中国黑龙江航行权，寻找东方出

海口，被说成是为了保卫俄国的东方领土不被英、法侵犯，甚至说成是为同清朝一道防御英、法。

(2) 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及以后《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中国东北、西北大片领土，被说成是“收复失地”。

(3) 沙俄在八国联军中充当了重要角色，还乘机单独出兵侵占中国东北地区，仅仅被解释为为了保护俄国侨民免遭义和团杀害。

(4) 只字不谈日俄战争以后主动联合日本，将中国东北划为北满、南满势力范围；又把肢解蒙古、策动外蒙独立说成是扶持弱小民族的独立运动。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德、英、美等国出现了“黄祸论”，为他们镇压中国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制造借口，以便更好地进行争霸远东的斗争。因此我们要恢复历史本来的面目。

“文革”之后，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取得了一些成就，如福建人民出版社有《从屈辱到崛起》丛书。最重要的如吴景平等：《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胡礼忠等：《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中俄中苏关系30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某一阶段，中美关系改善后就只谈友谊等。

五、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的史料

最重要的当然是中国与外国的外交档案史料，有：

胡滨编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

《英国外交文书选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甲午战争》第十一卷；

朱士嘉：《十九世纪美帝侵华档案史料选辑》，中华书局1959年版；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1901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齐鲁书社1983年版；

张蓉初编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

陈春华等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有关中国部分1911.05—1912.05），中华书局1988年版；

陈春华编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中华书局1990年版；

孙瑞芹编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3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甲午战争》第九、十卷；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8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

《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1932—1982）第一卷（1932—1934），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沿用了《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八卷大事记加附录的体裁）；

《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1932—1982）第二卷（1935—1937），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资料选辑》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程道德等：《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咸丰朝）、（同治朝）；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末教案》1~6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务教案档》1~6辑；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1~3册，三联书店1957、1959年版。

但要想使研究取得进展，就必须查阅原版，例如上海图书馆馆藏的美国外交文件。一些好的著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查阅并充分利用了原始档案，如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主要运用了美国外交档案；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主要运用了英国外交档案。又如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也是大量运用了美国外交文件。原始资料就观点不论，仅就史料而言，均有保存价值。

林则徐广州禁烟与美国人的关系

虎门销烟是人类历史上的壮举，是世界禁毒的先声。讨论在此前后林则徐与美国人的关系应是鸦片战争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关于这一专题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在李定一的《中美早期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和吴义雄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中华书局 2009 年版）对此有过专门的研究，只是由于两书的总体格局的制约，还是留下了一些可以继续讨论的空间。本文拟在两书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根据林则徐的文献，对他在广州禁烟时期与美国人的关系作一较为完整的探析，以教于各位大家。

一

1805 年 6 月和 7 月“尤塔号”、“风精号”两艘美国双桅帆船运载土耳其鸦片先后抵达广州，美国商人对华进行鸦片贸易由此拉开序幕。在此之后，质劣价廉的土耳其鸦片长期为美国商人所包揽，旗昌洋行就曾以自土耳其贩烟而获厚利。1817 年中国官方搜查海盗赃物时在美国船只“瓦巴西号”上查获鸦片，首次向美国方面提出严厉警告。^① 1818 年保商伍秉鉴因美船“沃巴什号”（Wabsh）运载鸦片被罚 160000 两白银。^② 1831 年经美商运到中国的土耳其鸦片为 402 箱。1831 到 1832 年度，美商所运的鸦片价值突破 200 万美元。^③

1834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被正式取消后，贩卖印度鸦片逐渐成为美国商人对华鸦片贸易的主渠道。由于此行当具有高额的利润，因此大多数从事对华贸易的美国商人均卷入其中。只有 1828 年设立的奥利芬行（Olyphant & Co.）主要考虑到如此违法行事可能会被中国政府停止贸易得不偿失，没有参与。^④ 为了逃避中国官方的稽查，旗昌洋行配置了“安特洛甫

①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第 73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② 【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二册，第 317 页，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③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第 70-71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④ 此外据说美国商人中尚有库星（Cushing）因与浩官联系而不从事鸦片贸易，参见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第 374 页，中华书局 2009 年版。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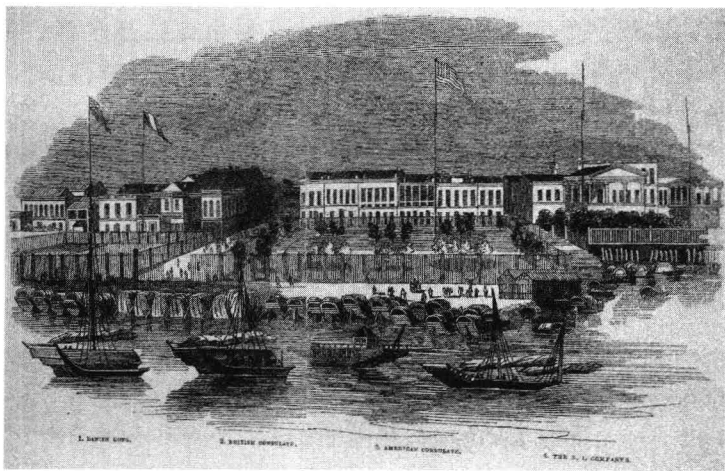
号”等飞剪船，进行鸦片武装走私，美国普金斯洋行 1823 年在伶仃岛附近洋面设置了第一艘美国趸船，随时进行鸦片批发。美商记连（旗昌）行也拥有伶仃号（Lintin）趸船。至鸦片战争前夕，在各国对华鸦片贸易中美国仅次于英国而占了第二位，美英不法商人在对华鸦片贸易上的利益也趋向一致。

1839 年林则徐奉命抵达广州后，在广东官绅的大力支持下，在当地禁烟工作进展顺利。3 月 18 日林则徐发布了《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令》，针对停泊伶仃等处洋面各国船只，“积存鸦片甚多，私行售卖”，下令夷人将船存藏鸦片悉数缴官，限三日内取结禀覆。

林则徐对外国人讲了以下几点禁烟理由：

一、“论天理应速缴也。查尔等数十年来，以害人之鸦片骗人银钱，前后所得不知几万万矣。尔则图私而专利，人则破产以戕生，天道好还，能无报应乎？……天之所厌，谁能违之！”

二、“论国法应速缴也。闻尔国禁，人吸食鸦片者处死，是明知鸦片之害人也。若禁食而不禁卖，殊非恕道，若禁卖而仍偷卖，是为玩法。况天朝贩卖之禁，本比吸食为尤重。尔等虽生于外国，而身家养活全靠天朝，而住内



火灾前的广州洋行

地之日多，……凡日用饮食以及积蓄家财，无非天朝恩典，比之内地百姓，尤为优待，岂尔等于天朝之法，转不知懍畏耶？……今则大皇帝深恶而痛绝之，嗣后内地民人，不特卖鸦片者要死，吸鸦片者也要死。试思尔等若不带鸦片来，内地民人何由而吸？是内地民人之死，都是尔等害之。……今仰体

大皇帝柔远之心。姑且饶尔等之死。只要尔等缴清烟土，出具以后永不夹带，如敢再带，人即正法，货尽没官。”

三、“论人情应速缴也。尔等来广东通商，利市三倍。凡尔带来货物，不论粗细整碎，无一不可销售，而内地出产，不论可吃可穿可用可卖者，无不听尔搬运。不但以尔国之货，赚内地之财，并以内地之货，赚各国之财。即断了鸦片一物，而别项买卖正多，则其三倍之利自在，尔等仍可致富。既不犯法，又不造孽，何等快活！若必要做鸦片生意，必致断尔贸易。试问普天之下，岂能更有如此之好码头乎？……中原百产充盈，尽可不需外洋货物。若因鸦片而闭市，尔等全无生计，岂非于自取乎。”

四、“论事势应速缴也。尔等远涉大洋来此经营贸易，全赖与人和睦，安分保身，乃可避害得利。尔等售卖鸦片，贻害民生，正人君子，无不痛心疾首，甚至与贩鸦片吸食之人死罹于罪，皆由尔等卖烟而起。……况以本不应卖之物，当此断不许卖之时，尔等有何为难？有何靳惜？且尔国不食，势难带回，若不缴官，留之何用？至既缴之后，贸易愈旺，礼貌加忱，岂非尔等之福！”^①

尽管林则徐从天理、法律、人情、时势全面论证了在中国做鸦片生意是贻害民生、祸国殃民的事情，但由于鸦片贸易的利益驱动，外商届时依然意存观望，拒不交出鸦片。3月24日在没有得到外国人应有答复的情况下，林则徐果断下令“将停泊黄埔贸易各国夷船先行封舱，停止买卖，一概无不准上下货物，各色工匠船只房屋，不许给该夷人雇赁。……倘敢违玩，本大臣、本部堂、本部院定即禀明请旨永远封港，断其贸易。”^② 必须指出，封舱断贸易并不是林则徐的新发明。这种强硬手段在以前也使用过，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在中国官方的强大压力下，美国领事吐哪（Peter Snow）无可奈何，“将一千五百四十箱烟土交付义律缴官”。事后他向林则徐呈文，诡称美商本身没有烟土，只存有为英商代销的鸦片1540箱，已经于27日退还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由他呈交中国政府。林则徐当时就认为其中有问题，批示：“察尔情词，显系有意捏混。”^③ 但由于美国领事言之凿凿，信誓旦旦，并出具了义律的收条字据，这才蒙混了过去。^④ 其实尽管有义律日后由英国政府赔偿损失的官方承诺，但还是有些美国商人不放心，他们自运的土耳其鸦片就有50箱左右没有交出。

① 《林则徐集·公牍》第65-66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② 《谕缴烟土未覆先行照案封舱稿》，《林则徐集·公牍》第61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③ 《林则徐集·公牍》第75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④ 参见《林则徐集·公牍》第93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同月，美商经（Charles. W. King）写信给林则徐，称：“远商几年在广东做贸易，从来不贩卖受交鸦片坭一斤，亦丝银都不买，又随时到处勉劝各人，以此项毒物万不应做矣。现在禀明钦差大人知道，远商应承后来更不贩卖鸦片、丝银，若有时做，就受刑罚。而此次忖想钦差大人宪仁政，必不忍将远商之货船买办事件阻留难为也。亦禀明过限期，因为远商想望如各商一齐禀报顺从。谨此禀赴钦差大人台前查察允准施行。”^① 经是 1836 年成立的广州外侨总商会第一届委员会的委员、1839 年 1 月又在广州参与发起“在华海员之友会”，任委员会委员。^② 经“是奥利芬行（Olyphant & Co.）的主要合伙人之一，他本人和这家商行都以拒绝从事鸦片贸易闻名”^③。因此由他出面写这封信是顺理成章的，也比较便于与中国官方沟通。

3 月 26 日即收信后的次日，林则徐即回信说：“本大臣到粤，访知该暹夷平日不卖鸦片，殊为出众可嘉。但本大臣早颁谕帖，令众夷人缴土，何以该夷不能迅速劝导？昨因多日未据呈缴，是以照案封舱。且奸夷有欲脱逃者，夷馆中四通八达，防范难周，是以将买办工人一概暂撤，以杜指引。今据禀有各商一齐顺从之语，如果速缴鸦片，何难事事照常？第该夷一面之词，恐不足据。一时开舱等事，尚难准行。仰广州府转饬洋商，明白谕知，仍催各夷人即速缴土可也。”^④ 可见，只要外国商人不贩卖鸦片，林则徐还是许可外国人作正当生意的。应当指出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林则徐亲自给美商回信是承担了巨大风险的。1834 年两广总督就律劳卑来华问题向英商解释：“天朝……贸易细事，向由商人自行经理，官不与闻其事。……天朝大臣，例不准与外夷私通书信。若该夷目投递私书，本部堂盖不接阅……凡此皆有一定制度，不容紊越。”^⑤ 林则徐所以这样做有着策略方面的考虑。他到广东数月后，对英国强悍已有所闻，认为“英吉利在海外最为强悍，诸夷中惟米利坚及法兰西尚足以与之抗衡”，因此宜“用诸夷以制英夷”，而不该“泾渭不分”^⑥。直接给美商回信就是区分良莠分别对待的正确对外交往手段，是为全面禁烟这个大局服务的。

5 月 2 日林则徐经过调查了解，决定扣留“积贯贩卖鸦片”的“夷人”16 名，其中有美国人记连。^⑦ 记连是 1836 年成立的广州外侨总商会第一届委

① 《林则徐集·公牍》第 62 页，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② 参见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第 213 页，中华书局 2009 年版。

③ 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第 37 页、第 60 页，中华书局 2009 年版。

④ 《林则徐集·公牍》第 61 页，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⑤ 【日】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 5 页，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7 年版。

⑥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九，页九。

⑦ 《林则徐集·公牍》第 96-97 页，中华书局 1963 年版。